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评传丛书

郁达夫评传

曾华鹏
范伯群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帆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评传丛书

郁达夫 评传

曾华鹏
范伯群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评传 / 曾华鹏, 范伯群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ISBN 978 - 7 - 305 - 08224 - 5

I. ①郁… II. ①曾…②范… III. ①郁达夫
(1896~1945)-评传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6554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

书 名 郁达夫评传

著 者 曾华鹏 范伯群

责任编辑 马蓝婕 编辑热线 025 - 83594071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8.5 字数 23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8224 - 5

定 价 46.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入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悲剧。我们是一个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干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结局。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起来的驱动力。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但是我想举证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入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的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作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读，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工具理性日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

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本套丛书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自由王国”境界的。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的写法。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的文化书籍。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丛书编委会

2012年1月

目 录

001 / 第一章	大风中的孤雁
016 / 第二章	岛国上的抒情时代
073 / 第三章	回到没有铁窗的囚牢
123 / 第四章	在革命的湍流中
179 / 第五章	西子湖畔的彷徨
219 / 第六章	迎着时代的暴风雨
275 /	结束语
279 /	初版后记
282 /	再版后记
284 /	新版后记

| 第一章 大风中的孤雁 |

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富春江就淙淙地歌唱着，日夜不息地流淌在浙江省的中部。她的清澈激湍的水流，滋润着两岸丰饶的土地，哺育过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人民。她具有异常优美的景色。早在一千五百年前，梁朝的吴均就对富春江的山光水色作了极为生动的描绘：“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与朱元思书》）在她秀丽的景色中，又点缀着许多名胜古迹，钓台和西台就是其中著名的两处。钓台相传为东汉时严子陵垂钓的地方，后世常以他辞帝归隐的故事作为歌咏那不贪富贵自甘淡泊的隐士的典故；西台则是南宋末年爱国志士谢翱因文天祥就义而击石歌哭悼惜忠良的所在。郁达夫在其《自述诗》里曾吟唱道：“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就是这富春江明媚秀丽的景色以及沿岸底蕴丰厚的人文环境，孕育着她的

儿女中的英杰和俊才，同时也激发了历代无数诗人美好的情思。

1896年12月7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的夜晚，郁达夫出生在富春江畔的富阳城里。他原名文，小名荫生，达夫为其表字。父亲郁士贤，早年设塾授课兼行中医，后来也曾任富阳县衙门户房司事。母亲陆氏。达夫为郁家幼子，长兄郁华，字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字养吾，比他大五岁，姐姐郁凤，比他大两岁。他的家庭原为书香世家，太平天国以后才逐渐破落；达夫出生时仅剩有一间旧式三开间的楼房和六亩薄田，家境贫困。因此郁达夫后来回忆儿时的生活时说：“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悲剧的出生》）

郁达夫出生在“风雨如磐黯故园”的苦难的年代。他说：1896年，“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設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悲剧的出生》）。另一方面，他的童年又是十分孤独的。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正像房屋断了支柱一样，这个家庭的生活也立刻倾斜了。于是，母亲艰难地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担子，经常在外面忙碌奔波，老是不在家里，年幼的姐姐也给送到环山村叶家当童养媳，两个哥哥早就上离家很远的书塾去念书，不能和他一起玩。在这个“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的家里，陪伴着他的，时常只是老祖母那凄凉而单调的念经的声音。郁达夫回忆说：“守了数十年寡的祖母，也已将人生看穿了，自我有记忆以来，总只看见她在动着那张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悲剧的出生》）畸形的时代，寂寞的生活，是形成童年时代的郁达夫比较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气质的重要原因。

由于生活的寂寞，郁达夫就怀着无限亲切的感情眷恋着大自然，而

美丽的、神秘的大自然也给这个孤独的孩子带来温暖和安慰，并且使他对生活产生了深深的热爱和丰富的遐想。他后来回忆说：“在小学校念书的时候——也许是在进小学校之先——记得老爱走上离城市稍远的江边上去玩。因为在那里有的是清新的空气，浓绿的草场，和桑槐的并列排着既不知从何处始也不知在何处终的树影，而从树丫枝里望出去的长空，似乎总是一碧无底的。在这些青葱蓝碧的中间，记得还有许多喳喳唧唧和悠然长曳地沁的一声便踪影全无的飞鹰的绝叫声听得出来。置身入这些绿树浓阴的黄沙断岸中间，躺着，懒着，注目望望江上的帆船——那时候这清静的前塘江上是并没有轮船的——和隔江的烟树青山，我总有大半日白日之梦好做。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忏悔独白》）当这个头上养了一圈罗汉发的清瘦的孩子沉浸在富春江上的山光水色中的时候，他幼小的心中就会升起一种新的惊异：“这世界真大呀！那宽广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那里来，上那里去的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象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到了天边，那么我的家呢？我的家里的人呢？同时感到了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乡井的离愁，眼角里便自然而然地涌出了热泪。”（《我的梦，我的青春！》）长日与秀丽的山水相对，培养了郁达夫对自然美的感受能力，孕育了他的诗人的气质。

在郁达夫童年时代的生活中，有几个受苦人的孩子，他们的纯洁、善良、聪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常照顾他的生活的使婢翠花，年纪很小就出来服侍人，她比郁达夫大约大十岁左右，勤劳能干，达夫的母亲整日在外奔劳，“家中的大小操作，全赖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一双手”；翠花是郁达夫寂寞生活中的伴侣，他说：“在我这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疼爱我的，却是那一位忠心的使婢

翠花。”这个失去童年欢乐的女孩子对待达夫却是异常的关心和疼爱。达夫的守寡的母亲在外面受到亲戚或邻居的欺凌，没有办法，便只好在丈夫的像前痛哭一场。母亲哭了，达夫也陪着哭，这时，翠花也会泪流满面，把达夫抱入怀里，用柔和的话语来抚慰他。有一次达夫不慎跌进大水缸里，失去了知觉，翠花又焦急又怜惜。他回忆说：“……醒转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一睁开眼，我只看见两眼哭得红肿的翠花的脸伏在我的脸上。我叫了一声‘翠花！’她带着鼻音，轻轻的问我：‘你看见我了么？你看得见我了么？要不要水喝？’”（《悲剧的出生》）对于翠花来说，她的童年没有幸福，没有欢乐，她自己并没有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但是她却处处关心、同情着郁达夫。这个受苦的女孩子身上所表现的纯洁和善良，不能不使郁达夫深深感动。除了翠花以外，郁达夫小时候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邻居名叫阿千的砍柴的少年。阿千的生活是十分穷困的，他“冬天穿的是同伞似的一堆破絮，夏天，大半身是光光地裸着的；因而皮肤黝黑，臂膀粗大，脸上也象是生落地之后，只洗了一次的样子”。这个穷苦的孩子却勤劳、懂事、乐观。平时，他背着钩刀和小扁担、绳索上山砍柴，碰到人家有丧事或娶亲，他也能去帮忙跑腿，他无忧无虑，整天边干活边唱戏，工作完了，也像大人那样上茶馆酒店。阿千虽然只比达夫大一岁，但他却是郁达夫小时候“所崇拜的英雄”。有时，郁达夫也跟随他到盘龙山上砍柴，在阿千的指点下，他知道了多少新鲜的事物啊：晴天里一声飞鸣过去的，是老鹰在觅食；树枝头吱吱喳喳，似在打架又像是在谈天的，大半是麻雀之类；远处的竹林丛里，既有抑扬，又带余韵，在那里歌唱的，是深山的画眉；而那长满绛黄色绒毛的薇蕨，炒起来吃味道还很好呢。郁达夫说：“这样问问，那样谈谈，阿千真象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辞典；而到盘龙山脚去的一段野路，便成了我最初学自然科学的模范小课本。”（《我的梦，我的青春！》）翠花和阿千，这两个年幼的受苦的劳动者，在郁达夫面前打开的，是多么美丽的

心扉，他们的善良、智慧、勤劳、朴实的优美品质，像春天的细雨，滋润着郁达夫的心田，甚至直到三十年后，这两个童年时代的朋友，还引起郁达夫深深的怀念。

郁达夫七岁时，就夹着绿色书包，拖着红丝小辫子，进书塾读书了。从自由自在的生活到关在屋子里死命地背书，这是多么痛苦的变化。因为在书塾里要从早晨坐到晚上，所以郁达夫和他的同学们就在读书时把身躯使劲地摇摆，并且放开喉咙琅琅地高叫，他们把这当作是“可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同时，“大小便，是学生们监禁中暂时的解放，故而厕所就变作了乐园”，有一个名叫陈方的同学每天早晨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后来弄得塾师没有办法，“就设下了一枝令签，凡须出塾上厕所的人，一定要持签而出；于是两人同去，在厕所里捣鬼的弊端革去了，但这令签的争夺，又成了一般学生们的唯一的娱乐。”（《书塾与学堂》）这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书塾生活，固然使郁达夫亲自体验到封建教育的僵死和不合理，认识到它是窒息和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沉重桎梏，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承认，郁达夫在这里毕竟也已初步获得一些文化知识。他后来写的《自述诗》说：“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郁达夫在受到文化的初步启蒙以后，在九岁时就以他的诗作显露了他的早慧和惊人的才能。

1907年，郁达夫正在就读的公立书塾——春江书院，改办为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郁达夫便成为最早的新式学堂生。在全校学生中，他的身体、年龄都是属于最小的一个。有几位同班同学是进过学的秀才，年龄都在三十左右，比郁达夫大了十七八岁，他们穿惯了袍子马褂的身躯，穿起制服来，背形微驼，实在不大雅观，这正显示了教育制度新旧交替期的特有现象。郁达夫虽然年纪小，但学习成绩却很好，这一年年底，因为他的平均成绩超出八十分以上，被学校提拔，和其他四位同学跳了一个

年级。这件事曾轰动了县城。

书塾改为学堂，从而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这在当时的县城和乡村不能不引起巨大的惊讶和震动，人们都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变革中的新事物。郁达夫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撤去了几排，一间象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的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家也在暗鸣得意。”在当时，甚至连学堂里作文课时发下的两个肉馒头，到乡下也被当作吃了“可以驱邪启智”的珍品呢。所以郁达夫说，“由书塾而到学堂！这一个转变，在当时的我的心里，比从天上飞到地上，还要来得大而且奇”（《书塾与学堂》）。在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郁达夫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学习英语。“十三问字子云居，初读琅嬛异域书”（《自述诗》）。他和同学们是以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好奇心来学习外语的。他们像背诵古文那样，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用了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来高声朗读英文词句；初学不久，就急于用毛笔在各种线装书上题上英文拼写的自己的名字；稍后，则用异样的发音，操着英语在同学中间开展“你是一只狗”、“我是你的父亲”之类的讨便宜的混战。应该说，这一段学习生活对于郁达夫的思想形成是有积极的影响的。在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的传统被废除，而代之以过去所没有过的新式的学堂，这说明固有的秩序正在改变，陈旧的事物必将被历史淘汰，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而学习外语，把郁达夫的目光引向“琅嬛异域书”，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陌生的、崭新的领域，这又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这种除旧布新的社会进步的现象，不能不在郁达夫的思想里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郁达夫像

郁达夫在书塾和学堂读书的时间,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民族的灾难,国家的耻辱,政府的腐败,使赤县神州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许多民主志士,正奔走于国内外,为推翻清王朝、拯救祖国而在准备一次血与火的革命。时代的暴风在少年郁达夫的心里也掀起了微澜,他开始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回忆说:“到了我十三岁的那一年冬天,是光绪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这富阳县里,也来了哀诏,发生了许多议论。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都从几位看报的教员的口里,传入了我们的耳朵。而对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国文教员拿给我们看的报纸上的一张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他说,这一位革命义士,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被清廷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掉了;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书塾与学堂》)正是这种活生生的时代和现实的教育,使少年郁达夫的心中开始萌生了爱国的情愫。

在家乡的书塾和学堂读了八九年书,郁达夫的文化程度逐渐提高,并且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因而也就能够初步接触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他说,他在读书时,“学校的功课,做得很勤,空下来的时候,只读读四史和唐诗古文,当时正在流行的礼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说和林畏庐的翻译说部,一本也没有读过。只有那年正在小学校毕业的暑假里,家里的一只禁阅书箱开放了,我从那只箱里,拿出了两部书来,一部是《石头记》,一部是《六才子》”(《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广泛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书籍,认真学习我国古代优秀的诗歌和散文,初步浏览了某些小说、戏曲作品,用心学好学校里的功课,这使少年郁达夫获得了一些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郁达夫“十五岁冬去小学”。1911年春,十六岁的郁达夫离开了他

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家乡富阳，由一位老秀才亲戚陪同，到一百里水路之外的杭州去考中学。当时交通不便，只能乘坐航船慢慢地摇，因而杭州就显得十分遥远了。出发以前，老秀才带着郁达夫先上祖宗堂前去点了香烛，行了跪拜，然后再向祖母、母亲作了三个长揖。当故乡的房屋人家从烟雾迷茫的江面上消失的时候，郁达夫的双颊上止不住地流下了两条冷冰冰的眼泪。然而当他在钱塘江上引领远望到杭州的高山时，这个少年的心里已经涌起了一腔勇进的热意：“杭州在望了，以后就是不可限量的远大的前程！”

投考的学校是当时最难考的杭州府中学堂，考试的内容是作文一篇，几句英文的翻译和四题数学。在等待发榜的闲暇日子里，郁达夫就和那位秀才亲戚以及当时已在杭州陆军小学堂读书的二哥郁浩一道，尽情地游山玩水，饱览了西湖的秀丽风光。待到他被杭州府中学堂录取时，带来的钱已经不够缴纳学膳费了，再加上杭州府中学堂没有宿舍，郁达夫只好另寻出路，终于和三位富阳来的同班同学相约，一道上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府中学堂去就学。后来他的《自述诗》里有一首是记此事的：“欲把杭州作汴京，湖山清处遍题名。谁知西子楼台窄，三宿匆匆出凤城。”

在嘉兴府中学堂半年，由于语言、风俗完全不同，而且又是初次离家远行，因而怀乡之念十分强烈。他说：“半年之中，当寝室的油灯灭了，或夜膳刚毕，操场上暗沉沉没有旁的同学在的地方，我一个人真不知流尽了多少的思家的热泪。”（《远一程，再远一程！》）这时，能够抚慰他的寂寞的心，让他寄托孤独的悲哀的，就是读诗和作诗。他在《自述诗》里写道：“吾生十五无他嗜，只爱兰台令史书。忽遇江南吴祭酒，梅花雪里学诗初。”并在诗的自注里说：“十五岁冬去小学，奖得吴梅村诗读之。是予平生专心研求韵律之始。前此唯爱读两汉书耳。”如果说，郁达夫“九岁题诗”只是一种天赋才能的显露，那么现在他就是自觉地专心钻研诗歌的